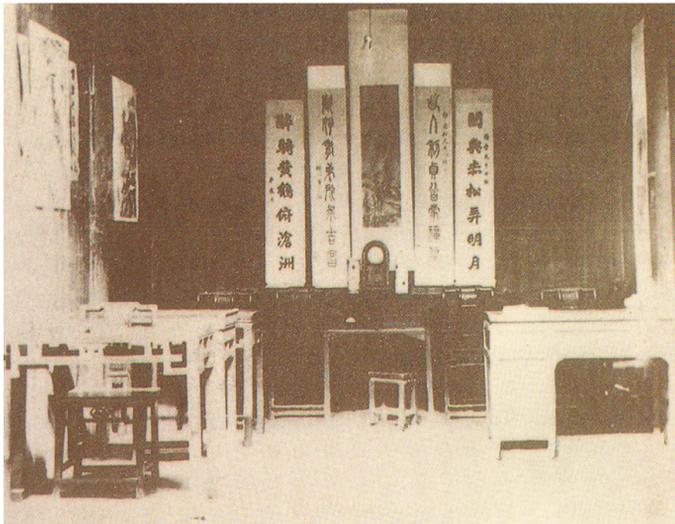




系列报道



万安私塾(少年陶行知读书的课堂)

陶行知出计算题

抗日战争时期,通货膨胀,物价飞涨,许多狡猾的商人开始囤积居奇、投机倒把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故意在粮食里掺杂了大量的石子、砂粒、稗子和霉烂的米。把这样的粮食卖出去,坑苦了老百姓,他们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。

育才学校也买了不少这样的粮食,不吃又浪费,但吃了这样的米,又不能消化,导致得肠胃病的师生也越来越多。看到这一情况,陶行知十分焦急。为了保证师生们

的健康,他不得不规定每天早晨用20分钟时间上一堂“选米课”:全校师生人人动手,把米里面的杂质一一剔除。

尽管如此,米里面的小砂子仍然很多,学生们吃饭时还是经常咯牙。学生们一嚼到砂子,立刻把一大口饭都吐了出来,食堂的餐桌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饭粒。

陶行知看到这个情况,摇了摇头,深深的叹了口气说:“这样下去怎么办呢?为了几粒砂子,吐出一口米饭,也太可惜了。谁知盘中餐,

粒粒皆辛苦啊!”

一天,等大家吃完饭后,陶行知一个人留在饭厅里,走到每张桌子前,把米饭一颗一颗数了,再按桌子分别包成小包,写上数字,带走了。第二天晨会上,陶行知很严肃地站到了讲台上,他环视台下的师生,语重心长地说道:“现在时局混乱,抗战也已到了最艰苦的阶段,加上奸商使坏,我们生活就更加困难!”陶行知不无内疚地说:“我这个校长没当好,让大家受苦了,请大家能够原谅!”接着,他话锋一转,有点气愤地说道:“粮食已经

少了,但有些同学却还是不知道爱惜,吃到砂子就把一口饭都吐了出来,我看了很痛心。昨天午饭之后,我数了一下每张饭桌上散落的饭粒,少的90多粒,最多的已经超过了600粒,这样下去,怎么办呢?”

听到这里,台下的同学们有的低下头,有的涨红了脸。陶行知接着出了一道算术题,让大家一起来计算,他说:“我们吃饭时浪费的米粒按每张饭桌上300粒计算,那么我们每顿饭浪费了多少粮食?如果把这些粮食算成钱以后,可以买多少发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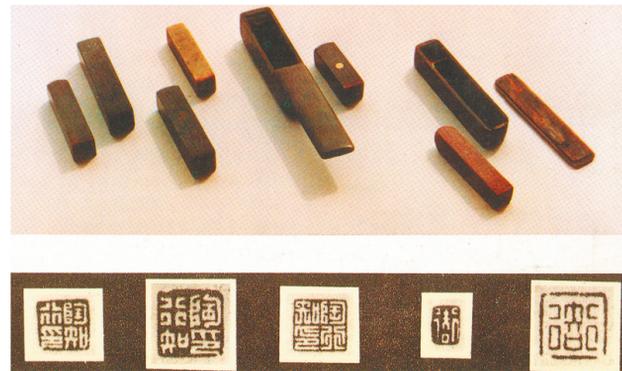
弹?这些子弹又可以消灭多少敌人?请大家认真算一下。”

同学们便都开始计算起来,当得出答案时,都不禁伸了伸舌头,羞愧地低下了头。接着,陶行知又带着大家朗诵了李绅的诗句《锄禾》。他接着说:“同学们,现在粮食来之不易啊!我们这样糟蹋粮食,太对不起前方的抗战将士和后方辛苦劳动的农民伯伯们了!”

从此以后,同学们在吃饭时吃到砂子,总是特别小心地只把砂子吐出来,餐桌上再也见不到饭粒了。



上海报童工学团



陶行知把名字“知行”改为“行知”(陶行知用过的印章)

陶行知向小学生认错

1932年,敌军查封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,师范附属小学被迫停课。附小的同学们自发办起了“儿童自动学校”,由学习好的学生当老师,连校长、工友均由学生担任,整个学校秩序井然、书声朗朗。

消息传出,教育家陶行知写了一首诗称赞:“有个学校真奇怪,大孩自动教小孩。七十二行皆先生,先生不在学生在。”

受到赞扬,同学们都很高兴。可是有个年仅八、九岁的小同学却找到陶行知,毫不客气地提意见:“照先生的写法,我们学校算不上‘真奇怪’。”

谁知,陶行知一点都不生气,反而和颜悦色地问:“小朋友你只管说,我的诗错在哪里?”那孩子指着第二行说:“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?我们学校,就有年级小但成绩好的小孩,做大龄同学的老师。要是像先生写的只是‘大孩自动教小孩’,有什么‘真奇怪’?”

“说得对!说得对!”陶行知立即认错检讨道:“小朋友,非常感谢你的指正,我马上就改。”说完,把“大”字改作“小”,成了“小孩自动教小孩”。然后又问:“这样改行不行?”

小孩咧嘴笑了:“先生改得真快真好!”

报童工学团

上海静安寺附近车站,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在叫卖:“新闻报,大公报!”穿得光鲜亮丽的先生、小姐们连忙呵斥他们走开。

陶行知在等车,一群报童围住他。陶先生笑眯眯地掏钱,向每一个报童买了一份报纸,报童纷纷找钱给他,他摇摇手说:“不用找了。”他拉着一个孩子的手问:“你们是逃荒来的吧?”孩子点点头。陶行知抚着他的头说:“真是苦了你们这群小朋友了。”

这时,来了一个外国巡捕,用警棍驱赶报童。陶行知用英语与他交涉,巡捕便走开了。报童们都感激地向他道谢,他却和蔼地说:“不用谢,你们快去卖报吧!”

几天后,静安寺的一条弄堂里,报童卖完了报都坐在地上。陶行知走来,孩子们齐声亲热地喊起来:“先生!先生!”陶行知与他们一起坐在地上说:“报都卖完了?”他拍拍身边一个孩子的脑袋又问:“你们什么时候有空?”“早上卖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,晚上卖《晚报》,只有中午有空。”“应该把中午的时间利用起来,学习文化知识,要过好日子没有文化可不行。”

陶行知将一个报童挽着坐在身边:“孩子,你们不会一辈子卖报,将来会有好日子过。有空一定要学文化,识了字人家就不会再欺负你们。”“读书?可我们没有钱买书和笔!”陶行知伸出手指说:“看,这就是笔。”他用食指在地上写了一个“人”字,大人小人的,做人的。

一位报童说:“我们没有书怎么办?”“你们每天卖的报纸就是书。你们识了字,会读报上的新闻,介绍报纸的内容,报纸才会卖得更快。”“没有老师怎么办呢?”陶行知想了一想说:“我每天早上提前几分钟来,教你们识字。谁识的字多,学得快,我就多买他的报纸。”从此,陶行知每天在静安寺附近的车站上教报童识字。

后来他请陈挺夫、方明来当小先生,在梵皇渡路荣庆里办了一个报童工学团。在报童工学团,这些穷苦的流浪儿童学识字、学文化,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,还有一些报童在陶行知的关心教育下,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陶行知洗衬衫

1939年7月,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创办了育才学校,在普修课外,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,开设音乐、戏剧、绘画、文学、社会、自然、舞蹈等课,培育人才。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,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。当时政治形势紧张,经济非常困难,为了把学校办下去,陶行知经常

要为筹集资金四处奔波,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。

盛夏的一天,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,想去看看。可是自己不认识路,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。他来到先生窗前,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:先生打着赤膊,脸上、身上流满了汗水,正在伏案疾书。高缨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来意告诉陶行知,没想到

被他一口回绝。高缨有些失望,但他很奇怪,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,也最愿意帮助别人,今天是怎么啦?

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,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:“我很想陪你去书店,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。过一个小时你再来,好吗?”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,心想:先生找借口吧?他说了一句“那就

算了”,就不高兴地回去了。

过了一个小时,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,笑嘻嘻地来找高缨一起上街。后来,高缨还是想不通,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。马侣贤说:“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,可是有谁知道,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,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为了坚持办学,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都送到当铺去了,好维持师生们

的生活用度。夏天,他只有穿着一件像样的衬衫,这也不稀奇呀!”

高缨听着马侣贤的话,眼圈红了,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行知上课时讲过的话:“为了劳苦大众,我们要饭也干;为了受苦小孩,我们要饭也干!”他的眼前出现了陶行知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,鼓励大家“勒紧裤带共度难关”的情景,他仿佛明白了:为了办学,先生舍得一切。



冯玉祥在晓庄师范欢迎会上与大家合影



冯玉祥送给陶行知的一身亚麻布衣服和一块怀表



晓庄联村自卫团合影(左一是刘季平)

救援共产党员

刘季平是晓庄师范地下党支部书记,晓庄被封后他是最早被捕的同志之一,后来他组织难友一起越狱逃到上海。

1932年6月,刘季平第二次被捕,正在上海的陶行知知道后心急如焚,为了筹钱请律师,他找了好多朋友,甚至当掉了自己的一些衣物,终于在四个小时内筹集到钱去律师事务所,请了一位知名的律师出庭辩护。由于律师的据理力争,法庭未判刘季平死刑,改为终身监禁,并转送东烟台监狱。

陶行知又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,派徐明清送到泰山交冯玉祥将军,因为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原是冯玉祥部下。陶先生在信中写道:“焕章吾兄,晓庄学生刘季平被捕,近已转送济南。敢仗鼎力救援。倘蒙援手,感同身受。弟知行

拜。”

冯玉祥见信后,立即找了韩复榘,尽力营救。韩复榘虽不敢贸然放人,但又不敢得罪冯玉祥,对狱中的刘季平也就没有多为难,拖了几年后便让刘季平出狱。

徐明清也是晓庄师范地下党支部书记,曾任晓庄共青团支部书记。1932年春天,她在上海搞地下工作,没有适当职业掩护,生活相当困难,她求助于陶行知。陶行知毫不犹豫,通过朋友介绍她到“上海一·二八难民工厂”任教育科长。

当时,上海各界募捐给难民的物资很多,但却被厂方克扣私吞。徐明清发动职工与厂方进行斗争,发展了革命力量。厂方恼羞成怒,借故把徐明清辞退了。她离厂时,职工列队送别以示对厂方的抗议。陶行知知道此事后,赞扬徐明清干得好,是正义的行动,并交给徐明清一个新的工作,叫她在上海北新泾

筹办一个新的工学团——晨更工学团,还对她说:“你们与山海工学团比赛,看谁办得好。”因此,徐明清有了一个公开、合法的身份进行党的工作。

不久,敌人开始监视晨更工学团,而且要准备下手了。党组织决定让徐明清转移。经陶行知介绍,徐明清又到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办的女工补习学校当教员。徐明清继续在女工中宣传革命理念,发展革命力量。

1935年,由于叛徒告密,徐明清不幸被捕。陶行知先生立即设法营救,并派了晓庄学生陆静霞与陈露薇两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。后来,徐明清被押解到杭州监狱。

时已仲秋,天气转凉,陶行知担心徐明清无衣物御寒,他就托女工朱冰如到杭州去送衣物。过了一些时候,冬天降临,陶行知又让朱冰如到杭州探望,说:“天冷了,再送点衣

物吧。”当徐明清再次接过了陶行知托交的衣物时,不禁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陶行知为了营救徐明清,四处奔波,多方联系,经过他的努力和党组织的积极营救。1936年6月徐明清终于出狱,并到了革命圣地延安。

戴伯韬是晓庄师范地下党员。1936年他跟随陶行知参加了育才学校的创建工作。皖南事变后,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,戴伯韬得到组织通知要赶快撤离。戴伯韬等五、六人隐蔽在陶行知住所的阁楼上。

有一天,陶行知回来告诉他们:“你们现在很危险,都不要再出去了!”风声越来越紧,不断传出共产党员被捕的消息。陶行知怕再住下去,会发生危险。使托人把其他几个人转移出去了,只剩下戴伯韬。敌人正到处寻找戴伯韬的踪迹,怎么办呢?他突然想到老朋友冯玉祥

将军。

一天晚上,陶行知把化了装的戴伯韬悄悄带到巴蜀中学冯玉祥公馆。陶行知把戴伯韬介绍给冯玉祥:“他是我的学生伯韬,他没有地方住,想在你这里住一阵,你看行吗?”冯玉祥非常相信陶行知的为人,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欢迎。

陶行知在告别戴伯韬时,紧紧握住他的手再三叮嘱:“你要处处小心,一切听冯将军的安排。但愿将来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!”他说完转身向冯玉祥拱手告别:“焕章兄,一切多多拜托!”冯玉祥爽朗地笑道:“你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学生,我会安排好的,你只管放心。”

戴伯韬在冯公馆住了一个多月。后来,冯玉祥让他装作士兵混在打猎的队伍里,将他护送出去,脱离了虎口。

(本栏目由 李俐均 周云 供稿)